



中国文化精神与现代社会

The Spiri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Modern Society

陆卫明 李红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文化精神与现代社会

The Spiri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Modern Society

陆卫明 李红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化精神与现代社会/陆卫明, 李红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 - 7 - 5161 - 7041 - 0

I. ①中… II. ①陆… ②李… III. ①中华文化—研究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834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侯苗苗
责任编辑 侯苗苗
责任校对 孙金波
责任印制 王超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5.75
插页 2
字数 267 千字
定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 研究价值	1
二 研究现状	5
三 研究内容	14
四 研究思路与方法	18
第二章 文化精神与文化研究	20
一 文化精神的界定	20
二 文化精神的特性	23
三 文化精神与民族精神	25
四 从文化精神研究文化问题	28
五 文化精神的创生性转化	30
第三章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生成	33
一 文化生态	33
二 儒道传统	55
第四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	75
一 以人为本	75
二 崇德重义	86
三 持中贵和	99
四 实践理性	110

第五章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转型·····	118
一 治理之道·····	118
二 社会和谐·····	127
三 民主政治·····	136
四 经济发展·····	147
五 精神文明·····	159
六 生态文明·····	163
第六章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强国中的战略地位·····	168
一 构建核心价值观的传统基础·····	168
二 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的传统资源·····	170
三 发展文化产业的传统背景·····	174
四 增强国际影响力的传统元素·····	177
第七章 中国特色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与凝练·····	181
一 核心价值观的意旨·····	182
二 中国特色核心价值观构建的原则·····	183
三 中国特色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元素·····	187
四 中国特色核心价值观的凝练·····	195
第八章 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构建的现实启示·····	199
一 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的构建·····	199
二 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的特质·····	215
三 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的社会化路径·····	219
四 共同价值观对新加坡现代社会建设的作用·····	236
五 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的现代启示·····	240
参考文献·····	245
后记·····	248

第一章 绪论

一 研究价值

本研究的价值，应从文化的力量说起。

众所周知，任何国家民族的文化中均具有精华与糟粕两个方面的因素，因此，它对社会发展既具正面作用，也有负面效应。“文化价值观可以阻碍进步，也可以促进进步。”^① 所谓文化的力量，是从文化的积极作用而论的。

文化的力量，主要体现为文化在革命与现代事业中所发挥的巨大促进作用。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的革命力量。”^② 这是第一次明确使用“文化的力量”这一提法。在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革命文化对推动革命形势发展及夺取革命的胜利自然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③ 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积极作用也日益凸显，业已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十六大再次肯定了“文化的力量”的提法，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些都凸显了文化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① [美] 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斯：《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4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5页。

③ 同上书，第708页。

现代化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在内的整体性变革过程。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有机组成部分，它既是文化自身发展的需要，又是现代化的先导力量与精神动力。尽管，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模糊不清、难以测量，现代化发展也并不取决于文化，我们不能落入“文化决定论”的泥淖，但文化对现代化发展具有巨大的反作用，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这里所说的“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实际上是对文化力量的具体化。习近平在2013年8月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更特别强调“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这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我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的新的历史定位。

文化对社会所起的进步作用，主要表现在：

首先，文化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产物与现象，是民族的血脉、国家的灵魂、人民的精神家园。它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宝贵财富与精神支撑，特别是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和核心的民族精神，它通过长期的熏陶和同化作用，培养起一代代人对本国家民族的文化认同、文化自觉，形成高度的归属感和自豪感，成为凝聚和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巨大精神力量。

其次，文化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反作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三种力量相互促进、合力作用的结果。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①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集中概括和经典表达，是关于文化与政治、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上的一个基本观点，它指出了文化对社会政治、经济的能动反应与反作用。这主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页。

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以其价值观影响人类的进步；二是文化是一种潜在形态的生产力。

最后，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综合国力是指一个主权国家拥有的全部实力，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在内的物质力、精神力以及国际影响力。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不仅从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军事实力等硬实力方面来显示，而且还要从文化软实力来评价。

明确了文化的力量，我们就能深刻地体悟到文化研究的功能与作用。

文化研究的作用何在？这是由文化的具体属性决定的。由于文化主要有以下三种属性，因此，文化研究的主要功能与作用也有以下三种：

首先，认知功能。这涉及文化的第一个属性，即文化问题实际上主要就是国情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所谓国情实质上即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传统的历史与现状。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的民族，认清自己的国情，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与每个人安身立命的前提条件。

其次，教育功能。这涉及文化的第二个属性，即文化问题就是人文素质问题。从中国辞源学角度来说，所谓文化即是人文育化、以文教化的意谓。人文素质，或者说文化素质，是人的知识与修养的集合，说到底就是人文素养问题。文化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开挖一个国家民族文化中所蕴藏的人文精神，不断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毕竟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这种人文育化主要是一种内化过程，它是在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中进行的，正所谓“润物细无声”。这比外在的强行灌输要有效得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突出优势，通过加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提高民族的整体素质，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重大课题。

最后，应用功能。这涉及文化的第三个属性，即文化问题就是社会资源问题。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一切有使用价值的东西都可称作是资源。文化当然有使用价值，因而也是资源，而且是一种潜力巨大的社会资源。这种社会资源一旦得到开挖利用，便可转化为巨大的财富。这种财富不仅仅是精神财富，而且还是物质财富。从精神财富的角度来说，文化问题实质上就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文化的重要作用就在于以价值观影响人类的进步。文化研究者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以现代化为参照系，创造性地阐

发优秀文化的精神价值,引领社会发展的方向,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从物质财富的角度来说,文化资源的开挖利用,能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当然,文化只是一种资源,一种潜在形态的生产力,要把这种潜在形态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还需要有中间的途径与形式。这种中间的途径与形式主要包括:文化教育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关键;企业文化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注入了强大的活力;文化营销是市场营销的利器;文化资源的开挖利用能够直接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因此,《文化经济学》有句名言:文化是明天的生产力!

理解了文化的力量和文化研究的价值,就可以理解本研究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一是学术意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一个重大的创新思想。如何从多个维度深化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研究,是学术界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本研究将从文化精神的视角和维度,深入探讨当今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传统背景,主要集中于优秀传统文化对推动现代化发展的独特价值与作用,这对深化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及两者辩证统一关系的研究有较大的理论意义,这是学术界公认的一大“显学”。

二是现实意义。中国传统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厚文化遗产,我们对之应该持有敬畏之心,发扬学以致用、经世致用的传统,加以开挖利用,使之成为现代文明的组成部分与现代化的精神动力。这已是当务之急。本研究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现代价值研究,研究重心在于进一步深入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及其在当今“文化强国”中的战略地位,这对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振奋民族精神、推进和谐文化建设等均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三是实践意义。本研究还将借鉴东南亚国家如韩国、日本、新加坡将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深入研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具体结合机理,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和谐社会建设相结合的具体方法与途径,提出建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系的具体对策设想,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二 研究现状

1. 关于文化精神的概念研究

就现有研究资料来看,国外最早对文化精神进行概念界定的是 W. G. 萨默,他在 1906 年提出“文化精神是使一个群体不同于其他群体的那些特征的总和”(W. G. Summer, *Folkways*, Boston, 1906)。这个观点引发了一些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关注和探讨,大体形成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行为特征说。在 20 世纪的前 30 年,学者们对文化精神的定义基本上都以“行为特征”做归结,如社会学家 K. 杨认为每个社会都建筑在那些使他们最不同于其他社会的一种“文化模式”或“社会特性”之上(K. Youny, *An Introductory Sociology*, N. Y., 1934);人类学家 G. 戈尔则认为,文化精神是“一个社会群体的各种行为观念的总和”(G. Gorer, *Society as Viewed by Anthropologist*, In the *Cultural Approach of History*, N. Y., 1940)。

第二,价值整合说。到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学者们对文化精神的探讨不再仅仅停留在行为特征这一表象上,他们开始探讨隐藏在行为背后的那些影响行为规范的根本的观念和概念,认为文化精神是一种整合的价值体系,是文化的内在品质。如克拉克洪认为任何文化都具有多元的特性,这种多元的特性又常常会整合在一起形成该社会的文化精神(C. Kluckhohn, *Covert Culture and Administrative Problems*, *Anthropologist*, Vol. 45, 1984)。著名的人类学家克鲁伯认为:“文化精神是用客观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主观价值系统。”(A. L. Kroeber, *Anthropology*, 1948)

国内学者关于文化精神的概念研究主要有以下观点:

其一,张岱年先生认为,文化精神是相对于文化的具体体现而言的。文化的具体表现,包括在器物、制度、习惯、思想意识等层面,无不和内在的文化精神相联系,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所有这些“文化现象中的最精微的内在动力和思想基础,是指导和推动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和基本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些思想观念或固有传统,长期受到人们的尊崇,成为生活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在历史上起了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成为历史发展的内在思想源泉,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

神。它是民族延续发展的精神动力，或者说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动力。”^①即认为文化精神是指民族文化中的精粹思想与精华部分，把民族文化中的糟粕因素排除在文化精神的范畴之外，是一个国家社会历史发展的精神动力，并把它与民族精神相等同。此论一出，在国内学术界相当流行，几成定论，它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占主流地位的观点。其实，这种观点值得商榷，这在下文中着重讨论。

其二，邵汉明等认为，“文化精神是具有相对稳定性的东西，可视为文化的深层结构，是民族文化的灵魂或精髓”。^②这与张岱年先生的观点实际上是相通的，如认为文化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灵魂与精髓，相当于“民族精神”、“国魂”、“民族魂”的概念，文化精神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中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深层结构，是深刻制约着文化发展方向的内在动因。

其三，李宗桂认为，文化精神即是反映一个群体的行为特征，又是一个群体内部各种价值观念的总结，是一个社会的社会成员所接受的整合性价值体系，也是一个群体不同于其他群体的根本所在。这个观点实际上是对行为特征说与价值整合说的综合。^③他认为文化精神是一个中性的术语，既包括精华思想，也包括糟粕成分，不能将它与民族精神简单地等同。这个观点很重要，有独到之处，值得引起重视，为理性地开展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立论基础。

其四，有的学者则将文化精神等同于文化传统，如认为“文化传统是指文化系统发展中相对稳定和连续的内容，是一种文化的基本精神”。^④这倒是一个新提法，其中，文化传统是一个中性的术语，在这一点与李宗桂的观点是相通的，但是这种说法主要是把文化精神等同于文化传统，这就有些简单化，文化传统有主流与支流之分，如果把文化精神主要归结于文化传统的主流，倒比较接近事实，否则就会把文化传统与文化精神的概念混同起来。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知，各种观点有一个共同点，即文化精神，主要是一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主要精神特质与深层结构，深刻地制约着一个

① 张岱年等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5页。

② 邵汉明主编：《中国文化精神》，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页。

③ 李宗桂：《中国文化精神和民族精神的若干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

④ 齐振海：《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哲学研究》1992年第6期。

国家民族的思想与行为的方向，对整个社会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分歧点有两个：一是文化精神究竟是指一个国家民族的占主导地位的价值系统还是行为模式，抑或是价值系统与行为模式的总和。笔者认为，文化精神主要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与观念，行为模式只不过是这种独特的价值系统的外化与体现。二是文化精神是褒义的还是中性的术语。把文化精神视为褒义的术语，就势必把它与民族精神或民族魂相混同，主要是指精华部分。而把文化精神看作中性的术语，则认为文化精神既包括精华思想，也包括糟粕成分，具有双重性。笔者认为，学术界对文化精神这个概念的理解上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误区，即将文化精神简单地等同于民族精神。确实有必要将文化精神和民族精神作区分。如果说文化精神是指民族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基本思想与观念，由于任何民族文化都有精华与糟粕的成分，因此文化精神也必然包括精华与糟粕两个方面。而民族精神则主要是指推动一个国家民族前进的精粹思想与观念，相当于文化精神中的精华部分。前者是学术用语，属于事实判断的范畴，后者是政治术语，属于价值判断的范畴。如果把文化精神与民族精神相混同，就会面临文化研究过程中的逻辑困境，陷入学术迷思与误区，也势必会使我们在对待传统文化资源问题上良莠不分。这绝不是玩概念游戏，它对我们科学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2.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的研究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的研究（或称基本特质、核心精神等），自从五四以来国内学者有不同概括，意见纷纭，主要观点有：

其一，辜鸿铭把孔子提倡的“礼”视为“中国文明的精髓”。“这种‘礼’就是良民宗教的本质，就是中国文明的奥秘”，“以礼来自我约束，非礼毋言，非礼毋行。这就是中国文明的精华和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所在。”^①他极力批判西方文化，提出以中国礼义文化“救西论”。面对当时学术界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大趋势，辜鸿铭的文化思想与时代潮流显得格格不入，在当时虽不免有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的色彩，具有浓郁的文化复古主义倾向，这是辜鸿铭中西文化观的主要缺陷。但是不要忘了，辜鸿铭具有举世公认的聪明及他对中西文化的深度认识，面对西方第一次世界大战形成的惨状所暴露出西方文化中的强权主义所带来的恶果，辜鸿铭极力倡

^①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6页。

导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价值观“义”和“礼”，特别阐释了礼的价值，自有他独到之处。他的中西文化观并非一无是处，对梁漱溟、张君勱等新儒学大家的某些思想有深刻影响，他对西方强权文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现在看来也并不过时。他把“礼”视作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这种观点至今尚有很大影响，仍是目前学术界的一种重要观点。诚然，中国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以一个“礼”字概括，未免过于简约化。笔者也认为把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概括为“礼”，失之片面，但仍不失为一种“极端的深刻”，自成一家之言。

其二，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①这是相对于西方文化与印度文化对人生的态度而言的。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在梁先生看来，文化之所以不同在于意欲之所向不同，文化精神即意欲所向之体现，由于西方、中国、印度文化的意欲不同，形成了世界三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并对世界未来文化的走向作了预言。五四时期，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经面世，便轰动一时，使他成为一位卓然文化大家。文化从本质上说即是特定的观念、态度、习惯，文化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特定国家民族的主要观念与态度，中华民族历来崇尚中庸、协和，这种思想深深地积淀在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几乎成了思维定式与行为方式的集中体现。因此，梁先生的这种说法有其合理内核。中庸之道，被孔子称为“至德”，道家和佛教对此均莫不推崇，对中国的国民性及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的影响至为深远。梁漱溟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把握有独到之处。后来，鲁迅先生于1927年在香港青年会所作的《无声的中国》的讲演中也说道：“中国人的情形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②不过把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主要概括为调和持中，并认为这是中华民族的意欲所决定的，不免过于抽象，难脱“文化决定论”的嫌疑，至于他据此提出的人类文化发展由西方文化至中国文化直至印度文化递次发展的三阶段

^①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383页。

^② 《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3—14页。

说，也易于陷入逻辑困境与文化悬谈。“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可以视作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精神特质与民族特性，但以此为根本精神，不免失之偏颇。

其三，张岱年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包括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贵和尚中四个方面。^① 姑且不论这种概括是否准确到位，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探讨，问题的关键是，张岱年先生对中国文化精神（准确地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的概括），是基于其把文化精神等同于民族精神这种概念界定的基础之上的，由于把文化精神与民族精神混同，在研究中就陷入了逻辑悖论，如文中在肯定上述主要精神的积极方面时，也坦承其中存在一些消极内容，如说：“天人合一思想，作为绵亘中国古代数千年的主导文化，作为弥漫于全社会的文化传统，它在自身的发展途中，既有丰富的内容，也有芜杂的内容。”^② 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的道德人本主义的思想传统，“有明显的重人伦轻自然、重群体（家族）轻个体的倾向”，“由于过分强调道德的作用，在客观上也有忽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的消极因素”。^③ 这倒是客观之论。事实上，天人合一、以和为贵、中庸之道等思想观念也并非完全是精华思想，其中存在一些缺陷，这在后文有详细论述。在这里问题就出现了，既然文化精神指的是精华思想，而他所概括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不可避免地包含了某些糟粕成分，而且精华与糟粕难分难解地糅合在一起，这在逻辑学上就不符合同一律，难以自圆其说，从而陷入了逻辑悖论。行文中的逻辑问题，反映了其对文化精神概念界定上存在的前提缺陷。

其四，庞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就是人文主义。表现为：第一，不把人从人际关系中孤立出来，也不把人同自然对立起来；第二，追求纯自然的知识体系，在价值论上是反功利主义的，在宗教上、文学上和哲学上则表现为富于实际性的认识。^④ 把人文主义概括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独树一帜，他不仅指出中国人文主义传统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不同内涵与价值取向，而且对它的双重作用作了分析。所谓人文主义，实际上就是以人为本的理念和传统，也可以说是人本主义。事实上，文化是人类社会特

①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7—394页。

② 同上书，第381页。

③ 同上书，第385页。

④ 庞朴：《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光明日报》1986年1月6日。

有的产物，本质上都是研究人的，都是以人为本的。中西文化均充满了人文主义的传统，关键在于对中西人文主义传统的精神本质与不同价值趋向的准确把握。庞朴先生对中西人文主义传统的不同内涵作了比较研究，力图以此凸显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品质，不失为一种新颖的研究视角，但把中国文化精神概括为“人文主义”，对具体的精神特质缺乏阐释，失之笼统。

其五，李宗桂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可概括为基于人文主义为中心的八个方面的内容：自强不息、正道直行、贵和持中、民为邦本、平均平等、求是务实、豁达乐观以及以道制欲。^① 这种概括实际上主要突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传统，与庞朴先生的说法是一致的，但李宗桂先生对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精神实质的具体内涵作了进一步阐发，并具体分析了其中的积极的与消极的成分，这是其主要贡献，缺点在于其概括的精神实质内容过于庞杂，略显松散，有些内容相互之间也不属于同一逻辑层面上的内容，还有豁达乐观、以道制欲等也提升不到文化精神层面。

其六，李泽厚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实质是“实用理性”。他说：“如果说，血缘基础是中国传统思想在根基方面的本源，那么，实用理性便是中国传统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② “中国实用理性的传统既阻止了思辨理性的发展，也排除了反理性主义的泛滥。它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构成了一种性格——思想模式，使中国民族获得和承续着一种清醒冷静而又温情脉脉的中庸心理：不狂暴，不玄想，贵领悟，轻逻辑，重经验，好历史，以服务于现实生活，保持现有的有机系统的和谐稳定为目标，珍视人际，讲求关系，反对冒险，轻视创新……所有这些，给这个民族的科学、文化、观念形态、行动模式带来了许多优点和缺点。”^③ 这种说法卓尔不群，独树一帜，是李泽厚先生的一大发明，对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趋向有着独特的体悟，对其中的优点和缺点也做了深刻分析，反映出作为一个思想大家的深邃与创见。这个重要命题的提出，的确具有重大价值，值得后人继续探索。不过李泽厚先生说的“实用理性”，主要反映的是中华民族的典型的思维模式，跟文化精神的内容毕竟是有区别的。文化精神是对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和行为特征等方面的综

① 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48—363页。

②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3页。

③ 同上书，第306页。

合概括，思想方式只是其中一个方面的内容，而不是内容的全部。

此外，近年来有很多学者认为和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和基本精神。如曹德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和谐”。^①把和谐视作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精神价值，是近年来一种广为流行的学术观点，已属老生常谈，当然有其合理成分，但对和谐精神的具体内涵缺乏深入阐释，此外，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丰富多彩的，也并非“和谐”一词所能涵括，如孙中山先生就把中国传统道德精神（实际上指的是文化精神）概括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和平与仁爱、信义等是平列的。

港台及海外学者对此也有各种各样的看法。

唐君毅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天人合一”。“中国文化精神之本原，吾人即可为中国思想，真为本质上之天人合一之思想。”^②钱穆也持此说。唐君毅先生理解的“天人合一”思想主要是孔孟思想为核心的心性论。他指出：“孔孟之精神，为一继天而体仁，并实现此天人合一之于仁于人伦、人文之精神。由孔孟精神为枢纽，所形成之中国文化精神，吾人即可说为：依天道以立人道，而使天德流行（即上帝之德直接现身）于人性、人伦、人文精神仁道。此意，使宋明理学言之，即以太极以立人极，而与人极中见太极。”^③唐君毅所说的“天人合一”的精神主要是儒家的思想，以仁义为本，并将之上升到天道、天理，人性与天性、人道与天道相类相通，因而可以合一。它既具有天道观的意谓，更具有人道观、人生观的意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绝非一些人所理解的“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统一”那么简单（包括季羨林先生也持此说），它是一个十分庞杂的命题，是儒释道共同倡导的一种文化精神境界，尽管它们强调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它们都把“天人合一”视作贯通自然、社会、人生的宇宙图式和古典系统论思想，其中既有科学的因素，也有迷信的成分。唐君毅先生的“天人合一”论，主要凸显了儒家的心性论思想，自有其合理性，但毕竟没能反映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全貌，如道家和佛教的天人合一思想也有其丰富的内涵。至于能否以“天人合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根本核心精神，尚有待进一步探讨。

① 曹德本：《和谐文化模式论》，《清华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②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19页。

③ 同上书，第318页。

美籍华裔学者孙隆基则引入“良知系统”与“深层结构”的概念来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他指出中国人的“良知系统”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所谓“深层结构”是指一个文化不曾变动的层次，它是相对于“表层结构”而言的。当然这个概念的运用并非指中国历史从无出现变化，而是辨认中国历史上由古至今比较稳定的某些规律，它们是使“中国”在历经变化后仍保持自身特殊认同的因素。与西方文化的“深层结构”具有动态的“目的”意向性，亦即是一股趋向无限的权力意志，使任何“变动”都导致不断超越与不断进步相比较，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则具有“静态的‘目的’意向性”。这是因为“中国人的‘良知系统’在个人身上造成的意向是‘安身’与‘安心’，在整个社会文化结构中则导向‘天下大治’、‘天下太平’、‘安定团结’，而其政治之意向亦为‘镇制民心’，使少知欲而不乱”。换言之，就是维持整个结构之平衡与不变。因此，“在‘表层结构’中尽可以出现变化，但是，任何‘变动’总不能导致进步与超越”。^①孙先生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成书较早，曾经广为流行。他提出的由中国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呈现出来的“深层结构”乃表现为一个“超稳定性体系”的形态这个论点，也风行一时。客观而论，这的确触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问题，尽管对这种核心问题的把握并不是很清晰的。他欲从中国历史表象中探求内在的规律性的东西，这种尝试不无裨益，尽管这种探究值得进一步商榷。的确，中国古代历史（并不包括近现代历史）确实存在着黄炎培先生所说的一治一乱的“历史周期率”，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任何王朝都没有跳出这种“历史周期率”的支配。以至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存有一种世界观、历史观，即历史循环论，正如《三国演义》开宗明义中所说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是，导致这种周而复始历史现象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真如孙先生所谓的中国的“良知系统”所决定的吗？如果是这样，岂不陷入了“文化决定论”的误区？中国文化核心价值中就没有革故鼎新的超越力量？中国社会历史就没有自我超越的内容？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余英时先生则提出“内在超越”来概括有别于西方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系统的个性特征。他指出“我无意夸张中、西之异，也不是说中国

^① [美] 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